

共和国将帅篇——陈庚 许光达

黄埔将帅



当代世界出版社

黄埔将帅



共和国将帅篇——陈庚 许光达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将帅 / 陈锡增编.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1

ISBN 7-80115-170-4

I. 黄… II. 陈… III. 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130 号

黄埔将帅

共和国将帅篇——陈庚 许光达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 字数: 41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115-170-4/K · 46

定价: 478.00 元

1 黄埔一期生

陈赓，乳名福哥，学名庶康，字传瑾。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排行第二。

陈赓幼时性情比较活泼，但当时的旧式家庭，对子女管束非常严格。从六岁起，前后念了六年私塾，整天死啃毫无兴趣的经书，非常乏味；再加私塾老师的责打，父亲的斥骂，他深感不满。直到1915年，十二岁时进入新式的东山学堂，才同新思潮开始接触。学校里的进步教员，时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传播“富国强兵”的思想。陈赓在这里读过一些进步书报，知道了一些新鲜的事物，眼界大为扩展，开始朦胧地懂得一些“列国强，我国弱，列国富，我国贫”的道理。初步觉醒的民族意识，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树立要“富国强兵”的抱负。

1917年，为了逃避家人强加给他的婚姻，陈赓离家出走，加入到湖南鲁涤平部的军中。后又到长沙铁路局当了个职员。陈赓就一面在铁路局做事，一面进各种补习学校和夜校，顽强刻苦地进行自学，他还努力学习英语，希望自己将来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材。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也愈加高涨。陈赓到长沙后，曾经参加“青年救国会”等进步的群众团体，向群众宣传救国道理，到街头检查、抵制日货，积极从事反帝的爱国运动；还参加了由于湖南省长赵恒惕杀害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所引起的罢工风潮。他曾进过自修大学，同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团体有了密切的接触，得到几位共产党员的帮助，政治觉悟日益提高，1922年12月，他十九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3月29日，本已从长沙考入广州程潜办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陈赓，在一次上街闲逛时，发现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

招生广告，便大呼小叫地喊着“考错了！考错了！”然后拽着同学宋希濂，又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参加了在那里进行的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亲临主持。当时场面异常壮观，500名学生整齐严肃，精神焕发。

黄埔第一期新生共编成四个队，陈赓被编进第三队。这个时候，广州是中国大革命的摇篮，黄埔成了革命青年的熔炉。在这个黄埔小岛上，真是风云际会，革命的空气非常浓厚。正如黄博军校的校歌中唱的：“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军校的学生，大都是共产党在各地有计划地动员组织进来的，因此，许多学生倾向进步。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凡是优秀学生，差不多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当时在文艺活动方面也很活跃。第一期学生自己组织的百花剧社，曾经自编剧本，上演了一些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话剧。这个剧社的领导骨干，多半是共产党员。它在黄埔的影响很大。陈赓是这个剧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还亲自担任演员。因他富有表演的才能，每次演出都很成功。

同班同学关麟征，为人故做傲慢，自命清高，使陈赓很看不惯。一次出操，趁教官不注意，陈赓向关麟征做了个大鬼脸，他把舌头伸向左边，而鼻子却扭向右边，双眼一睁一闭，关麟征看了不禁笑出声来，却被听见笑声的教官打了两个大嘴巴，而此时的陈赓却站得笔直，若无其事，反而受到了教员的表扬。气得关麟征咬牙切齿：“好你个陈赓，小心点儿！”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等着！”陈赓淡然一笑。

然而历史却做了一次这样的安排：1936年2月底，红军东度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调集十八个师的军队沿黄河阻拦，陈赓的部队恰与关麟征的队伍遭遇。“对不起呀，关麟征，你的那个部队被我陈赓消灭了。”在占领了关麟征部队的阵地后，陈赓打了一个这样的电话，关麟征只好报以无奈的苦笑。

当时在黄埔，蒋介石暗中支持组成了一个反共的封建买办军事法西斯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他们经常和陈赓所参加的由黄埔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军人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发生冲突。李仙洲是陈赓的同学，当时是“国家主义派”成员，以“醒狮派”自居，实则是“孙文主义学派”的同党，被骂作“狮子狗”，在广东大学的一次集会上，“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与“孙文主义学派”及同党发生争斗，双方大打出手。陈赓恰好和李仙洲打作一团，李仙洲是山东大汉，人高马大，陈赓打不过他，只好操起一只板凳当作武器。可即使是这样的激烈争斗，也没影响陈、李二人的私交。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任国民党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李仙洲被我军俘虏，后来仍然向陈赓发去电报叙旧，陈赓也回电晓以大义，对李以礼相待，使李深受感动。

黄埔第一期学生，连同入伍教育在内，学习了七个月，1924年11月底毕业。陈赓在学习期满毕业以后，被留在军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根据党的指示，他积极地参加了历次革命斗争。1924年10月，黄埔还未毕业，他就参加平定商团的战斗；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案发生的时候，又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带队捉拿暗杀廖案有关的人犯，几夜没有睡觉。他曾亲见1925年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他所带领的连队，有二十多名士兵在和帝国主义军队作战中牺牲。在这次战斗中，他深刻感受到群众力量的伟大，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残暴。在1925年6月29日开始的省港大罢工中，陈赓曾被调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参与训练工人纠察队的工作。他还积极参加了扑灭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

陈赓每次作战都很勇敢。1925年5月，杨、刘叛乱的时候，在东征军回师广州准备向叛军进攻的前几天，指挥部派陈赓渡过珠江侦察敌情。其时留在广州的革命部队只有吴铁城的一个警卫团，已和各机关一起撤退到河南（一些要人聚集在河南纺织路士敏土厂旧址孙中山的元帅府内），北岸市区尽为军阀部队控制，只有沙面一带可以渡江。他便脱掉军服，穿上西服，坐一艘小艇北渡。划船的是一个船家

姑娘，船到江心，两岸的军队突然隔江射击起来，枪声猛烈，起初船家姑娘非常害怕，陈赓却很镇定，对她劝慰鼓舞，很快渡至沙面，和秘密的革命机关接头以后，即由沙面进入广州闹市。

他在街上走着，遇到几个敌人沿街散发反共反苏的传单，一捆一捆丢在地上还未拆散，他就拣了几千张反动传单带回沙面。自此每次出去，便带一些在身上，假装散发传单的人，碰到戴红帽子的滇军要搜查，就塞过去几张。这玩意儿竟然比通行证还灵，带着它到处可跑，粤汉、广九车站也能够去。经过三天工夫，陈赓便把广州敌军主要设防情况侦察清楚，并且绘出详细地图。敌人的火力阵地和部队位置，都在图上——标出。

6月12日，东征军发动进攻。陈赓率领他的连队，渡过珠江，一气打到北校场，杀得敌人溃不成军。敌人被打败了，杨希闵准备沿广九路退到石龙。陈赓带着党的指示，到火车站去侦察敌情，同时发动工人罢工。他冒险跟广九车站的工会接上了头，通过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发动群众，并且把工人带到沙面集结。当时杨军残部本来都已上车，党组织和工会一声令下，被敌人临时抓来的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顷刻间逃跑一空，造成敌人极度混乱。

“照我自己的理想来训练一批有志的青年，完成建国建军之使命。”在就任黄埔军校校长时，蒋介石雄心勃勃地说。他在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起床号音一落，蒋介石便开始巡视全校师生员工的宿舍，他还坚持在员工食堂就餐，每个星期找十几个学生谈话，所以几乎所有的黄埔学生都与蒋单独见过面。蒋介石与陈赓的第一次接触也发生在此时，陈赓的睿智机敏和旺盛的革命热情，给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25年10月，东征军攻打惠州，陈赓在负伤的情况下仍拼死冲杀，最后攻进了叛军头目杨坤如的司令部，占领了惠州城。不久，蒋介石就召见了陈赓。

“报告校长！”陈赓立正行礼，“好，好。”蒋上下打量着英气勃勃的陈赓，见陈赓的左脚还露着纱布，不禁感动地说：“陈赓，你很勇敢，是校长的好学生，回去带你的连队到我这里来报到吧！”从

此，陈赓及其所属的连队担任了东征军总指挥部的警卫任务。

攻克惠州后，东征军分三路继续向东开进。27日，由第三师师长谭曙卿率领的第三师，由于不明敌情，冒然深入，在华阳与叛军林虎的主力部队遭遇，陷入了重围，作为东征军总指挥的蒋介石，闻听战况激烈，亲自来到华阳督战。却未料到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蒋介石所率领的总指挥部也与第三师的残部一道，被围困在一座小山上。第三师的官兵基本上是由原来的粤军改编而成，军纪松散，战斗力弱，被打得溃不成军。山上的蒋介石又惊又气。

“陈赓！陈赓在哪里？”蒋介石大声喊道。“我在这儿，校长！”陈赓从附近的战壕中跳了出来，站在蒋介石面前。

“你马上到前面去，以我的名义命令谭曙卿，不许退却，马上去！”

陈赓穿梭在密布的弹坑和横七竖八的尸体当中，终于找到了手扶军刀、一筹莫展的谭曙卿，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谭师长苦笑一声，“好吧，我执行。”他提起军刀，硬是从如潮的退兵中拦下了一些士兵，又向山下冲去。一阵密集的炮火又把他们拦了回来。

陈赓见状，立刻又回到了蒋介石面前，还没等他报告，蒋介石就伸手拦住了他，刚才的一切，他已经看见了。蒋介石望着山下，一言不发，条条青筋在额头跳动，突然，他转过身来，两道锐利的目光盯着陈赓，“陈赓，你是黄埔的骄傲，军中的英才，我命令你为三师的代理师长，立即收容溃散的士兵，重新组织抵抗”。陈赓二话没说，又抽出驳克枪，冲到了山坡上的那些潮水般涌来的溃兵当中，他不停地鸣枪、叫喊，均无济于事，被乱军冲到了一边。山下传来的枪声越来越远，山上总指挥部的官兵也被冲散，陈赓看着呼号溃逃的士兵，又回头望望山上，一跺脚，又重新上了山。

“校长，你都看见了，他们不听我指挥，先随指挥部撤退吧！”他劝道。

“不撤！我不撤！”蒋介石摇着头，十分伤感地说：“我唯有自杀以成仁，否则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校长何出此言，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快走吧！”陈赓不住地在

催促。

“我们必须反击！”蒋介石仍不动。

“对，校长，你是总指挥，要顾全大局，我们先转移到别的地方，再组织反击。还是先冲出去吧！”陈赓说罢，与蒋介石和其他一些军官和卫兵一起，从后山向进行合围的敌军的结合部冲去。子弹和炮弹不停地掠过，他们当中也不断有人倒下。好不容易冲到山下，蒋介石却又一下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我不走了，我还有什么脸再回去！”“好不容易打下了惠州，却没想到要葬送于此！”他声泪俱下。

眼看着林虎的追兵越来越近，陈赓心急如焚，他一躬身，背起蒋介石，带着一些卫兵继续向结合部的一条小河冲去。爬过泥坡，穿过草丛，来到河边，陈赓立刻找了一只小船，把蒋介石扶进船舱，又布置了手下的几个士兵在河边掩护，自己划着小船，向对岸驶去。一直到黄昏，终于脱离了险境。

在一间被废弃的旧房子里，火光照亮了刚刚从战火中死里逃生的人们。“此地不可久留。”蒋介石开口了，“我们必须跟驻扎在合浦的何应钦的第一师取得联系，让他们来接应我们。”他看着四周的军官们，“谁辛苦一趟，把我的信送去。”回答他的是噼啪作响的树枝燃烧的声音。

“我去！”又是陈赓站了起来。

合浦距此地 160 华里，中间不仅要穿越坡地、沼泽，还横亘着一座海拔 1300 多米的莲花山的主脉，山上茂密的丛林中，不仅有昼伏夜出的华南虎，还有无数的土匪强人，凶险异常。对于这些，陈赓不是不知道，但他更清楚，如果就这样拖延下去，援军迟迟不到的话，一旦叛军展开搜索，更是险不可言。而此时此刻，如果他陈赓不站出来，不会有第二个人。

“好的，好的！”望着陈赓疲惫的面容，蒋介石深为感动。他走到陈赓的面前，轻轻用手弹去陈赓肩上的一株枯草，然后拍着陈赓的肩膀，“又得辛苦你了！”蒋介石也很清楚，在此时此刻，最值得他信赖、最能承担起这个任务的人，非陈赓莫属了。

接过蒋介石写好的信，化装成农民的陈赓带了 50 块大洋，以备

不时之需，转身没入了茫茫的夜色中。他穿过沙沙作响的草丛，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泥泞的沼泽当中。莲花山的主脉终于横在了他的面前，在漆黑一片的山路上，树叶哗哗作响，还不时从远处传来野兽的哀嚎，令人毛骨悚然，陈赓舔舔干裂的嘴唇，摸摸藏在衣服里的信，把口袋里的大洋弄得叮当响，以此来为自己壮壮胆，后来又小声地吹起了口哨。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向前走去。

“站住！”黑暗中有人在大喊。陈赓一愣神，恰好脚下一绊，等抬起头来时，却发现身边站了不少带枪的人。“赶路的。”他回答道。

“好一个赶路的，痛快点说吧，你是姓陈的部队还是广东的革命军？”这时，陈赓终于看清，面前站着的人，都是农民打扮，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有长短枪、老套筒、猎枪、大刀、还有梭镖，不像陈炯明、林虎的叛军。

“是广东的革命军”，陈赓回答。“真的？”“谁扯谎就让他去喂老虎！”“好吧，我们不难为你，快赶路吧！”一个头目模样的人说。陈赓整理了一下衣服，一一向众人道谢，刚要动身赶路，那个头目模样的人又喊住了他，“我们都是些被逼上山的农民，后面的路上还有我们的弟兄，你带上这个，可以少些麻烦。”说完，他从腰里摸出张纸和一根炭棍，在纸上划了几个奇怪的符号，交给了陈赓。陈赓满怀感激地掏出一些银元，众人坚辞不收，陈赓再三坚持，头目从银元中抓起几块，挥手与陈赓道别。

一路上，陈赓果然又遇到了几次拦路的，见到那张“通行证”，就没再难为他。第二天中午，陈赓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何应钦和周恩来立刻派一团人马急行军，把蒋介石及其随员接了回来。后来才得知，林彪的部队得知蒋介石就在此地，以为遇上了东征军的主力，不仅没有乘胜追击，反而不战而逃了。这就是陈赓冒死救蒋的全部经过。从此，蒋介石对陈赓另眼相看，拼命拉拢。但到后来，一旦他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无疑，陈赓就立即离开了蒋介石，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

“陈赓是个人才，救过我的命，我非常器重他，可他政治上糊涂，跟着共产党跑了”。后来，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人这样说，言语间不胜唏嘘。

2 战斗在敌人心脏

从参加革命起，陈赓就走上了—条危机四伏的征途，然而每次他均以自己的机智勇敢化险为夷。

1926年9月，党中央派陈赓去苏联，在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1927年回到上海的时候，正逢蒋介石叛变革命，大事摧残革命力量，捕杀共产党人。他即前往武汉，跟留在武汉的黄埔学生组织—个黄埔同学讨蒋委员会，发表了讨伐蒋介石的宣言。4月下旬，他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这时武汉反动分子公开封闭工农组织，压迫群众运动，大规模逮捕和惨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汪精卫等甚至提出口号：“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人漏网。”革命的武汉已经成为反革命的根据地了。

7月下旬陈赓便随着周恩来乘船秘密到达九江，7月27日转往南昌，8月1日参加了南昌的武装起义。起义开始的时候，陈赓在起义总指挥部负责保卫工作，率领—些同志，连夜在市区逮捕了—些反革命分子，并且接管了江西省银行。

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陈赓在贺龙的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营担任营长，跟部队—起向广东进发。这个部队是东江、湘南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士兵的政治觉悟高，战斗力比较强。—路上，起义部队受到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革命虽然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群众的斗争意志仍然是很坚强的。8月下旬，部队经过抚州、瑞金，在会昌地区和反动军阀钱大钧、黄绍竑等的部队激战了—场。钱大钧的部队先我军到达会昌。第三师是先头部队，—到会昌附近就和敌人接了火。会昌战斗是在8月30日，本来我军预定拂晓开始攻击，因为

部队走错了路，迟到早晨八点才开始。陈赓带领第一营的部队，八时起由正面发起攻击，一气攻下三个山包。原计划在两翼发动攻击的部队没有按时赶到，变成孤军深入。这时敌人派四个团来堵截他们，打到中午，我军后继部队还没有到。因此打得弹尽援绝，尚未把敌人击败。占压倒优势的敌人疯狂出击，我军支持不住，便向后撤。

撤退时陈赓走在部队后尾，下午一点钟负了重伤，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断了，胫骨被打伤，不能行动。他见敌人的追击部队赶来，为了避免敌人搜查口袋图发洋财时发觉他还活着，忙脱掉身上的制服，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条野草丛生的田沟里。腿上的血一直在流，把田沟里的水都染红了。这时跟随他的卢冬生也跳下来照顾他。不久下来几个敌人搜索，他因自己不能行动，便劝卢冬生快走。卢冬生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很机警地躲进附近草棵里藏起来。陈赓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一身一脸，以此欺骗敌人。敌人走近来的时候，他把牙齿咬紧，闭目屏气，准备一死。结果，敌人以为他已死掉，在他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

躺在那里过了两三个钟头，下午四点钟左右，叶挺带领的部队反攻上来，立即把敌人打垮。听见山上人叫马嘶，唯恐是敌人溃退下来，陈赓仍不敢动。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我们的搜索部队过来，又把他当敌人打了一枪托子。他睁开眼睛偷看，见他们颈子上都挂有红带子（像现在少年先锋队员戴的红领巾一样），知道是叶挺的部队反攻了，便高兴地说明是自己人，卢冬生也出来讲。这时前边我军已经占领会昌，他便也到城里，见到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许多同志。此刻重逢，格外亲切。

会昌战斗后，部队未照原计划直下寻邬、梅县，而改折向福建的汀州（长汀）、上杭一带。陈赓因为伤势很重，便坐船顺贡水前往汀州。刚一上船，敌人突然反扑回来，一直打到江边，他坐的船也中了子弹。正好周士第带的二十五师赶来，一个反攻，又将敌人打垮，他也得救。到了汀州，他和起义军的一部分伤员曾进福音医院治疗。这个医院是傅连璋办的。那时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当起义军来到的时候，不但没有离开，还在医院里面接收了我军三百多名伤员。重伤的

陈赓被安置在医院外面的新安楼。医生来诊治时，因为流血过多，又未能及时得到治疗，他的身体异常虚弱，负伤的腿已经红肿得发亮。但在这里治疗的时候，他却非常坚强地和伤痛斗争。他以顽强的毅力遏制着这断骨的疼痛。他那乐观的情绪，坚定的笑容，风趣的言谈，引起医护人员的无限钦佩！

陈赓随起义军到了汕头，不久，起义军又撤离了汕头，而陈赓却由于住院，与部队又失去了联系。在几位热心的护士和工人的掩护下，陈赓与负责照顾他的卢冬生上了由汕头开往香港的轮船。

船到香港，船上的每一位乘客都受到了巡捕的严密盘查，受伤的陈赓更成了重点盘查的对象。

“你是哪里人，怎么受的伤？”一个巡捕问。

“我是潮州人，在潮州电报局做事。”陈赓操着一口学来的广东话，一边回答，一边装出疼痛难忍的样子，以掩饰他不太熟练的广东腔。

“潮州人？恐怕是汕头逃来的共产党吧？”巡捕一边问，一边观察着陈赓的脸色。

“怎么会呢！大哥，仗一打起来，我吓得从楼上跳楼逃跑，却把腿摔坏了。”陈赓回答道。

“好吧！”又一个巡捕凑了上来，“你说你是潮州人，在电报局干事，那我问你，电报局在什么地方？”“在韩文公庙隔壁”，陈赓对答如流，毫无破绽。巡捕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知道陈赓答得不差，又见他一脸斯文相，便挥手放行。

陈赓和周逸群、卢冬生乘船到达上海，已是10月中旬，他们很快找到了党中央。党组织了解陈赓的伤势严重，设法送进有名的牛惠霖医院医治。牛惠霖曾留学英国，和他曾在美国留学的弟弟牛惠生都是骨科医生。他们的医术高超，在上海很有名望。许多“党国要人”和有钱的阔佬都找他们治病。他们是宋庆龄的表兄弟，政治思想倾向进步，一向同情革命。他们深知宋庆龄素来爱护黄埔学校的进步师生，宋庆龄又是这次南昌起义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及其主席团成员。因此当牛惠霖得知陈赓是南昌起义中的伤员，经过千辛万苦

来到上海求医的时候，便精心治疗，保住了陈赓多处负伤的腿，从此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

1928年4月，他伤势尚未痊愈，就在上海参加了由周恩来领导的党的特科工作，与中外反动派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1927年5月，中央军委成立了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后来，为适应工作的需要，又在下面逐渐建立了四个科：第一科（总务科），它的经常性工作包括替中央领导机关租房子，为负责同志安排住处、布置中央开会的场所，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处理善后事宜，租家具，做生意，对牺牲了的同志负责收敛，料理家属生活等等；二科是情报科，专门负责搜集各种情报和反间谍工作；三科专门负责做安全保卫工作，著名的“红队”就由三科具体领导，专门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和营救同志；四科是交通科，专门负责秘密交通联络，特别是无线电联络。而陈赓同志就专门负责领导二科的工作。

1928年春，为了适应对敌工作的需要，中央特委开办了为期20天的训练班，恽代英，周恩来同志做了政治报告，陈赓等绝大多数特科的工作人员和红队队员都参加了。

1930年，上海卡德路的一幢房子里，几位小姐太太模样的人一边在楼下打牌，一边“欣赏”着从留声机中传出来的软绵绵的歌声，走廊中和院子里，不时有身穿厨师、佣人、园丁、门卫服装的人在来回忙碌，一切似乎非常平静。而在楼上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却围坐着身穿西服、长袍的人，看看桌上的东西，又不禁使人大吃一惊，桌上放着几支手枪，还放着几副手铐、脚镣之类的刑具。一位书生模样，身穿长袍，年龄不过三十的青年正在熟练地为在场的众人详细地讲解各类枪支的修理、拆卸、示范如何对付枪支突然卡壳，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拆装和应付其它意外故障知识。他熟练的动作，精辟的讲解，无不使在场的众人露出惊讶、羡慕的目光。他就是陈赓。原来，这是中央特委专门为红队开的一个短训班，而陈赓，则把自己从苏俄学来的秘密工作技术向红队队员们传授。

“下面，请一位同志用手铐铐上我的手！”陈赓说道。让红队的

一名队员从背后用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他把手背在后面，眼睛神秘地冲大家眨着。不一会儿，咣啷一声，两只手竟从手铐中挣脱了出来。当大家啧啧称奇后，他摊开手，只见手指缝中有一根细小的钢丝。“瞧，我把我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了，不过，我可不希望大家有带上手铐的那一天呀！”他做了个鬼脸，众人都露出了笑容。训练的内容包括熟悉情况，培养观察力，化妆术，脱身术，密写信函，监视与反监视，破译密码和编制暗号，学习射击和其它一些技能。这一切，都为红队后来威震上海，使特务、叛徒闻风丧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大上海，有一位叫王庸的年轻人。他气度不凡。出手大方，而且为人热情，善于交际，其交际对象遍布三教九流，就连帝国主义租界的巡捕房中的巡捕和大小特务，也与之交往密切，无不把他看作是“自己人”。一次，由于叛徒的告密，特务和巡捕突然包围了位于法租界内的一家戏院，有一批共产党员正在里边开会，特务们正准备分头行动，那位“王先生”却“恰好路过”此地，许多特务和巡捕同他打招呼。一名特务还在他耳边悄悄说：“王先生，瞧我们抓共产党吧！”

王先生立即露出一一种好奇的神情，“抓共产党，那太好了，弟兄们，算我一个！信不信得过我？”特务们一听，纷纷嚷道：“王先生说哪里话，走，同去，同去。”在分头行动时，王先生主动提出去把守一个出口，特务们均翘起大拇指说：“王先生有胆量。”有个特务还叮嘱了一句：“王先生，当心些，共产党很厉害的！不行了就喊我们帮忙！”“放心吧！抓住了共产党，我请兄弟们的客。”王先生慷慨地说。

其实，这位“王先生”王庸，就是当时的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同志。其结果自然很清楚了，许多被包围的共产党员，就通过这个出口平安离去了。

这个时期，陈赓在异常艰险的条件下坚持工作。随时准备与可能遇到的敌人格斗，夜里睡觉的时候，都把手枪压在枕头下面。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他不但经常变更住址，还要时常改变自己的身份，变

幻自己的形象。时而西装革履，像似租界里惯见的西崽；时而全副武装，又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时身穿短装，头戴鸭舌帽，充当敌特或捕房的“蟹脚”；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又是巨商大贾的模样。陈赓经常爱穿长衫，有时到工厂里工作，又改穿工人服。当时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工作的张克侠将军回忆说：“陈赓同志来时是化了装的，他穿了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一进门便高声招呼，十分亲切。他英姿焕发，诙谐善谈。我先已听说他在不久前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伤，问他伤势是否严重，伤口是否复原。他立刻当场表演起来，一会纵情跳跃，一会又下蹲屈腿，显示他的伤腿已经彻底痊愈。我们交谈彼此的见闻和感受，十分和谐。”陈赓置身龙潭虎穴，和敌探特务周旋，敌人对他不但没有怀疑，而且认定他是自己人，见面时全都很亲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

陈赓的活动，使得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一提到陈赓的名字又恨又怕，千方百计地想捕捉他，杀害他，曾为他的头颅悬了巨额的赏格，却无法找到他的踪影。实际上，那时候他经常来往于一些国民党特务当中。但是，敌人始终没有发现他就是陈赓，不晓得他就是他们日夜谋算的那个共产党人。

陈赓在中央特科主持的情报科，是专为搜集情报、掌握敌情、专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而设置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如果不对敌人采取进攻，就不能达到保卫自己的目的。特科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手段，深入敌人的要害部门，及时打破它的阴谋活动。

陈赓进行调查研究后，在专业的反共领导机关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从而为深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控制上海侦探机关打开了局面。接着，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又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位同志打进了国民党设在南京的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杨登瀛这个关系，建立起来是比较顺利的。1928年1月，蒋介石

石在争夺反革命领导权中暂时取得胜利。为了加强特务工作，以对付反蒋势力和革命力量，1928年2月，他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它的第一任科长是陈立夫，总干事是杨剑虹，他们在物色上海特务机关负责人的时候，选定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是广东人，自幼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他日语很好，交游广阔，与几个日本通讯社都有关系，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人也很熟悉。他在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书籍，回国后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也和共产党员交朋友。他通过杨剑虹和陈立夫、张道藩也混得很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吃喝玩乐，无所不谈。因为杨登瀛认识一些共产党员，对共产党表示同情，我们有事找他帮忙，他也尽心给办。国民党要他作侦探，他接受了；但是要搞反共活动，他在思想上有矛盾，感到如果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朋友，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帮共产党做点事，既可在国民党里作官，又可以不担风险。因此，他表面上接受了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又同当时和他比较熟悉的、在特科情报科工作的共产党员陈养山商量，愿同共产党建立关系。

中央特科对此事进行了研究，决定派陈赓同杨登瀛见面，做他的工作和研究具体工作方案。从此，杨登瀛就成为我党在敌人侦探机关里发展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陈赓让他利用与陈立夫、张道藩、杨剑虹的关系，大胆地接触敌人进行活动。为了帮助他应付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常给他送去一些我们党的宣言、传单和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作为他接近敌人的资本；还供给他一些有关党的活动情报，真真假假，去应付敌人；有时还故意留下一些党的机关或布置一个假机关让敌人去破坏，让敌人觉得杨登瀛真的很能干，对他深信不疑。

为了提高杨登瀛的社会地位，陈赓请示中央特委批准给他买了汽车。1929年10月，替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一个办事处，作为情报集散的地方，陈赓派安娥去当秘书，连德生当他的保镖，跟随他出入敌人的侦察机关，有了情报，就及时送到陈赓手里。